

[文章编号]1004—5856(2008)09—0110—04

试析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经济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吴霞

(德州学院 历史社会学系,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对华进行军事、政治侵略的同时,也在积极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近代西方经济学由此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来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完整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艾约瑟;传教士;西方经济学;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JK254.3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中国众多知识分子都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富强典范,但他们对这个制度真正的了解却很少。在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争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为当时的中国经济领域填补这一空白的是西方在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为近代中国向近代化的过渡做出了贡献。本文研究对象艾约瑟(1823~1905)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来华后,他翻译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系统介绍西方经济理论,支持中国女子教育,研究中国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艾约瑟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震撼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从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魏源于1842年刊行的著作《海国图志》首开近代中国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

张,他在书中极力呼吁当政者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并且还主张大力发展军事企业和民用工商业。林则徐很同意魏源的观点,也大力呼吁当政者不要盲目自大,一定要睁开眼睛努力了解西方世界,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确实看到了中国的弊病,并且做了很多努力,以求得中国能够进步。

鸦片战争的失败,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西方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眼界的限制,中国最初的变革者只希望在不触动既有封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到传统经济中,从而达到“挽狂澜于既起、扶大厦于将倾”的结果。事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良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继魏源、林则徐之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写了《资政新篇》一书。自此以后,向西方学习,发展各种工业、矿业、交通、邮政、银行、保险等企事业的思潮广为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不断扩

[收稿日期]2007-09-27

[作者简介]吴霞(1980-),女,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展,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了先发展军用企业、后发展民用企业的实践活动,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洋务运动也没能使中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洋务运动后,经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呼吁,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开始形成,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主流的封建意识形态使各行各业形成了“士农工商”的顺序。正如吴汝纶在严复翻译《原富》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习惯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由此可见,在中国发展工商业需要克服相当大的思想阻力。

除国人积极探求变革之路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在积极传播西方文化。从那时起,近代西方经济学就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早在1867年(即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了“富国策”这门课程,它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斯特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提要》。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作为北京同文馆的教材正式出版,这是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富国策》外,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出版了《富国养民策》,原书是由英国人杰文斯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入门》。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广泛介绍和传播,一些经济范畴的词语很是流行,包括分工、资本、工价、地租、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艾约瑟等传教士根据西方通常的观点作了常识性的介绍。其介绍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中心。艾约瑟写道:“英人亚当·斯密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无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1](P10)}可见,他们推崇的“经济自由理论”也确实有助于冲刷阻碍中国前进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专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经济观念。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操作方面,他们也介绍了一系列的实际知识。例如,银行和公司的有

关章程,货币的统一和发行,建立有预算、决算制度的现代财政,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他们甚至还介绍了劳资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以及合作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为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做了一定的准备。

严格地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但是作为和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19世纪中国理应走向的那个新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对比中西,禁不住想对中国的各个方面有所建树。客观的说,他们的意见会比洋务派推行的路线高出一筹,而与中国早期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遥相呼应。当然这些建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明显之处在于他们对投资少、获利快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仍然强调不够。他们经常严厉批评洋务派只是盯着军事装备,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是过分强调铁路、煤、铁等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其实,当时的中国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把最有利于资金积累的轻工业和纺织业作为发展重点,扫除阻碍它们自由发展的种种障碍。其实传教士们也曾提到过要发展轻工业,可惜没有引起中国当权者的足够重视。

二、《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理论的完整介绍

艾约瑟极力推荐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对亚当·斯密学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体现在艾约瑟翻译的《富国养民策》一书中,此书于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此书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翻译,因为艾约瑟翻译时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因此严格说来,《富国养民策》当属艾约瑟的编译著作。文中同样采取了中西和今昔对比的方法阐述中国走向富强的具体途径。自1893年8月起,《万国公报》开始连载艾约瑟的这一长篇文章。此时正值戊戌变法前,艾约瑟的努力对于构建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氛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该书介绍了西方生产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对分工、资本、工资、地租、利息、股份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艾约瑟赞成“分工操作”,但是他也看到了分工操作的弊

端,认为分工操作无益之一是“令人动作能力偏狭有限制”,无益之二是“技艺过烦多歧”。^{[2](P13607)}

艾约瑟详述了“工价”(即工资),指出:“有宜谨慎之一事,兹时按富国养民策学言,工价地租利息与平时用此三名时,未免有少许不同也。譬云:‘工人工价内即有数分生息地土,租价亦十之八九含有数分生息利银在内也,且人所目为资本之利银。’曰:时实统工价租价合计。”谈到工人的工资时,艾约瑟提出:“人之才力不齐,工拙不等,谋干能为有异,胡能强使其同归于相若之工价(工资)乎?才力能干既不相等,工价亦应不相若。”^{[2](P13607)}“人之才技优劣不同,生来资质有聪明愚鲁,身体有强壮懦弱,并习技艺时合机缘不合机缘也。”这实际上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最早表述。

艾约瑟认为中国统治者崇尚“蓄财”、抑制消费的做法无助于“增利”和“生财”。他提出的“增利之法”是购买股份,“生财之源”是增加土地、工作和资本,这实际上是把生产三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

“凡谈及地时,意即以其为生财之源也,供给人生于世间,需用之物,无不统括于内耳。”“虽有若许财物,无术使之变为致富源头,如是观之,极明显者。是非有勤谨恒久精明灵巧之工作不能使之化为财也。”^{[3](P13227)}“无论世间何工作,除极费力者不计外,十之八九不能无资本,以备供养工人之米粮,固工匠工作时恃乎?财是以谓之资本耳,亦可呼之为工本。无工本,谋生之若等人,不知藉何糊口,恐不能免于死亡也。”最后,艾约瑟对土地、工作和资本作了排列:“诸物并人工皆属不之缺之上等,居其次者即资本耳。”^{[2](P13607)}资本主义社会是讲求“利益”的社会,艾约瑟谈到了如何工作才能获得更大的财富,提出三点:“何时得宜”、“何地得当”、“何式样合宜”,概括起来讲就是,需要在合适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和用正确的方法。

艾约瑟于1893年介绍了西方的行会(即行业工会)组织,认为“工作人设立行会,大半为增其工价也。”并称成立行会是为增加工资的极妙的办法。他说:“各行技术工人,平素视为多增工价之妙法者,则大众立一行会,强逼督工主人增银数也。”而且艾约瑟还介绍了行会的

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写道:“此等行会之式,即于本一行业中,选立数人出首为董事,众董事酌议条规,本行人俱应遵守。凡入会者,盖捐输银钱,以为会中经费,既属如是,所定之会规,参差不齐,有顺乎情理甚善者,亦有乖谬而出乎情理之外者矣。而各行会商订之事,各有不同,于人不幸,遇非常大故,加丧葬并保养病症等事,则可大有补助。”^{[2](P13607)}可见,行会具有一种慈善的意义。

艾约瑟还把工人入股称为解决劳资冲突的“极嘉”之策:“所拟议操作人可得益之诸策,有一推为极嘉,现欲论说者,即资本主与操作人(工人)合归于一也”。而“合归于一也”的办法则是“工人集股成本通力合作”,“此等行局,利益匪浅”,其益处就是“能令若许人收有资本,留心于贸易事,兼能使铺户减其货价,且知以礼貌待人,斯时当有铺户人布告,谓货价与行局者相若矣”。^{[2](P13607)}

工人们成立行会的初衷是增加工资,但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艾约瑟分析道:“行会罢工而争长工价,十中六七不获坊作主俯允,一应停工作之人,徒受少得银钱之损。纵使坊作主俯允,所增来之工价,据公平理观视,即不强勒把持,而忍气等候,亦可位伊等增益,且立行会罢工之患,不惟有工作人少得工作之损也,于坊作主之生意并资本,均有亏折,终得归过于操作人身边矣。由是观之,行会约定止工受之损,实有不能抵补者矣,大抵为冒昧糊涂也。”^{[2](P13607)}

三、艾约瑟经济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中国经济的指导作用,还在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被儒家经学所控制,实用知识被视为“形而下”的知识,经济思想不过是“商贾负贩之学”,难登学术殿堂。桐城派文人姚鼐称:“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4](P531)}他断然把经济学排除在了学问之外。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传教士的介绍和宣传而逐渐成为一门学问。因此近代经济学理论的传入是

儒家经事之学摆脱理学的钳制,趋向独立以及中国学术文化由封建旧学发展成为近代新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艾约瑟并未局限于把西方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到中国,而是在此基础上,他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通货、中国的税收政策和中国的银行与物价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出版了三本著作:《中国的通货》(1890)、《中华帝国的税收》(1903)和《中国的银行与物价》(1905)。

艾约瑟在1905年出版的《中国的银行与物价》一书中,专门辟有《山西票号》一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艾约瑟是最早从事山西票号研究的。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中外经济、金融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这项研究起始于清末,抗日战争之前达到高潮。艾约瑟首开山西票号研究的先河,对后来研究山西票号的学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综上所述,艾约瑟把西方的经济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尤其介绍了分工、资产、地租、利润、利息、工价、经济周期等理论。这些知识在

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很新颖的知识,使当时对经济知识感兴趣的学者受益匪浅,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视野。而且他还对中国的通货、金融、银行和货币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介绍,对中国关注经济理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指导作用。他认为,发展经济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应该大量吸收和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能否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可以说,这些经济上的较有建设性的提案正中当时中国经济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开拓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艾约瑟.富国养民策[N].万国公报,(43).
- [2]艾约瑟.富国养民策[N].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2册,1893.
- [3]艾约瑟.富国养民策[N].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1册,1893.
- [3]艾约瑟.富国养民策[N].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1册,1968.
- [4]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唐金石

The Effect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Joseph Edkins' Economy Theory on Chinese Society

WU Xia

(Dezhou College, Dezhou 25302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been diffusing actively their philosophy and culture mean while conquered China militarily and politically. Modern western econom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Joseph Edkins, a missionary from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troduced the western economy theory, based on which h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e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 This has been affected the Chinese society at great level.

Key words: Joseph Edkins; missionary; the western economy; the Chinese society